

一个甲子的传奇与辉煌

——北京人艺60年院庆随想

宋宝珍

2012年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迎来了其建院60周年的日子,关于它的一个甲子的传奇与辉煌的历史,已经有了大量的媒体报道和学术总结。曹禺、焦菊隐、赵起扬、欧阳山尊等的人格风范,他们建院之初的艺术梦想,剧院在时代风雨中的顽强奔突,一大批优秀艺术家的光彩夺目,一大批保留剧目的久演不衰,剧院的文化品格和艺术道路……无论从哪里落笔,都是写不尽的话题,说不完的业绩。

北京人艺的光环有多么耀眼?它的存在具有怎样的艺术魅力?我或许难以描述。但是可以举个小例子,从侧面加以佐证:数年前,有位戏剧学博士毕业后希望留在北京工作,几经努力却不能如愿,只好迁往外地,临行前,他遗憾地说,我以后将无法看到北京人艺的戏剧演出了,还怎么研究中国戏剧?在他内心深处,北京人艺即使无法涵盖中国戏剧的成绩,至少也是最重要、最典型、最具研究价值的成功案例。

诚然,北京人艺拥有自身的传统和优势。它是北京市委重点扶持的戏剧机构,是人文北京艺术特色的标志;它拥有雄厚的创作演出实力,建立了颇有规模的保留剧目轮换制,聚拢了一大批老中青优秀人才;单是一个首都剧场,就足以让所有关注中国话剧事业的人们,将目光凝聚在这里。因此,这里是现代艺术的殿堂,是中国戏剧的希望。

60年来,北京人艺以《雷雨》、《日出》、《北京人》、《龙须沟》、《茶馆》、《蔡文姬》、《丹心谱》、《绝对信号》、《小井胡同》、《狗儿爷涅槃》、《红白喜事》、《李白》、《万紫千红》、《白鹿原》、《窝头会馆》等富有当代意识和文化精神的剧作,从艺术的角度书写了民族的文化史、心灵史。此外,作为中国

话剧的骄傲,它第一次走出国门演出《茶馆》,便被西方人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它第一次在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里探索小剧场戏剧,便使这一先锋性、探索性的艺术形式迅速普及;它第一次以开放的胸襟与国外艺术家精诚合作,便开启了新时期以来中外戏剧交流的先河……

北京人艺纪念六十载艺术征程,这既是过去的告别,也是新生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既往成绩的总结固然重要,对未来的前瞻和预想更为迫切。毋庸讳言,机遇与挑战并存,北京人艺也有待解决的问题。当他们在为现实而求索、为理想而努力的时候,我认为,若想继续开来,不断进取,应当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一是历史、现实与艺术的关系。北京人艺拥有值得夸耀的历史,它不是云烟而是积淀的艺术经验,它无法阻断而昭示着未来的艺术发展。北京人艺不是高高在上的象牙塔,故拥有中国作风和民族气派;它也不是闲人雅士的手把玩珍,故可以满足广大普通民众的艺术需求。

北京人艺是“人民的剧院”,为纪念院庆而拍摄的电视纪录片也以“人民的艺术”命名。然而,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民已经不再是历史上工农兵的代名词,随着社会分工的繁杂,人民有着更为广泛的构成和更为复杂的内容,因此摆在北京人艺面前的现实难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复杂,更艰巨。人民是否简单地等同于消费者?一般消费性的艺术产品与文化积淀性的经典作品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分别与联系?这都是待思索、待解答的问题。

当艺术的经典性被当下消费的商业大潮逐渐吞噬之时,当戏剧的精神价值被娱乐至死的解构

模式消耗殆尽之时,北京人艺不仅面临服务对象的考量,还面临着市场经济的挑战,戏剧是民族精神和文化品格的艺术载体,还是实现宣传目的和票房效益的现实工具?换言之,以艺术的恒久性价值为目的,还是以艺术的快餐式消费为前提,在今天已经是一个需要选择的命题。当一个又一个剧团被流行文化时潮裹挟而去的时候,人们像守望灯塔一样守望北京人艺,因为它不那么商业,不那么功利,艺术的尊严和品性还在,虽然也慢慢地流失,人们还是期待它能守住艺术的净土,不做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是做卓然而立的高尚士。但是,前路漫漫,知向谁边?

二是继承、发展与创新的关系。60岁的北京人艺,已经步入花甲之年,正期待着新的发展。通常人们认为,北京人艺的宝贵之处,在于它拥有自己的演剧学派,焦菊隐创造性地发展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提出了心象学说,这一表演方法被不断探索,形成了人艺现实主义风格的创作特色。新时期以来,这一学派以开放的胸襟,吸纳和消化着来自异域的文化果实,开拓着自己的艺术道路。就此而言,北京人艺从来没有固步自封,而一直是在探索发展。

继承、发展、创新,本是一种艺术优势赖以延续的方式,但是却陷入了现实的严重纠结。诚然,老一代创作的艺术典范,对于今天而言,仍具有示范作用和借鉴意义。若不然,保留剧目的演出何来观众欣赏?然而,即使是在《茶馆》的演出里,我们也无法让濮存昕变身郑榕,让梁冠华变身于是之,让杨立新变身蓝天野,让何冰变身英若诚。每一代演员都面临着不同的观众,都有自己的天赋才华和艺术个性,描红模字式的恢复经典,不仅不现实而

且不可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场演出的好坏无从鉴定,每个观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在恢复精神和文化品格的艺术载体,在经典时,演艺水准若何常常是高低立判。继承不容易,创新更难,没有功力,不费心血,便是外型上描摹下来,骨子里的缺失也是难以遮掩。

的确,焦菊隐创造了北京人艺的演剧风格,但是他也提出了推陈出新,“一戏一格”,“演出者不守望着北京人艺,因为它不那么商业,不那么功利,艺术的尊严和品性还在,虽然也慢慢地流失,人们还是期待它能守住艺术的净土,不做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是做卓然而立的高尚士。但是,前路漫漫,知向谁边?”

三是编剧、导演与演员的关系。北京人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一流的编剧、导演和演员,这么多的一流加在一起,成就了北京人艺一流的演剧实力。无论是从前“郭老曹剧院”的提法,还是新时期以来刘锦忠、郭启宏、邹静之、万方、莫言、刘恒剧作的加盟,都显示着北京人艺对剧本高品质的文学性的注重。但是,电视剧的浮躁发展与猛烈冲击,使得戏剧的编剧队伍逐年锐减,北京人艺概莫能外,因此,怎样找到适合人艺风格的剧作,以便发挥人艺演员的表演特色,仍然是现实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导演和演员方面,北京人艺看起来人才济济,拥有实力,但是如今声名显赫的演员,多已人到中年,新一代“小荷才露尖尖角”,如何发现、培养和提升他们的表演素质,依然是值得关注的

问题。保持一个剧院的特色,关键是要出人、出戏、出效益,如何创造一个良性的艺术环境和人才培养机制,仍然是北京人艺艺术发展的重要命题。

编剧、导演、演员,本来是一部完整的戏剧艺术的共同创造者,但是目前的关系却显得略有游移,若即若离。甚至有时一出戏只剩下导演这张王牌,演员被隐设在合拢的幕布中。而在焦菊隐的导演生涯里,连跑龙套的小演员,最后都能成为大艺术家,他的“一棵菜”精神,就是要培养所有的人,在艺术的集体氛围里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而不是在导演王牌下、在明星光环里埋没艺术创造的个体。

在老一代演员身上,充分体现了“对于艺术事业无限的忠诚”,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不断努力,成就了北京人艺表演艺术的巅峰时期,而今天的表演水准,离此高度仍有距离。某些演员将舞台艺术当成跳板,开始在电视剧中捞取资本,文化功底正在弱化,舞台上的表现每况愈下,这是北京人艺的拥趸们最为担心的问题。

北京人艺一甲子,如《论语》所言,六十而耳顺,赞美词听得太多固然爽心,而逆耳忠言或可明智。北京人艺应当反思,在多大程度上在消耗着前辈艺术家积攒的家底,又在多大程度上为它增添了新的积蓄?在这座艺术的圣殿里,可曾意识到身份的特别和责任的艰巨?

也许不必质询北京人艺向何处去,因为中国有句老话,船到桥头自然直。但是中国只有一个北京人艺,北京人艺已经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因此,凡是热爱戏剧的人们都会期待,北京人艺再创奇迹,高树新枝,繁花无数,“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让灵魂跟上来

洪明

印第安人有句箴言:“当我们走得太快的时候,停一停,让我们的灵魂跟上来。”初次读到它,觉得很奇特,也很古老。仔细品味,才体会它言之切切,意味深长,可谓金玉良言。我们自己,不也曾唯恐跟得不紧,或者急功近利,把“灵魂”拉下吗?

“文革”那种风行“假、大、空”的时代,就不用说了。就在平时,我们是否也由于虚妄的欲念而丢失了灵魂?回想上世纪80年代,搞学问的人急于创立新学说、新理论,“新”观点此起彼伏,或者一知半解,就急忙炮制论文,生怕未能抢先机会。进入2000年以后,这种风潮仍是此起彼伏。例如引进的解构主义,一时间风靡文坛,长篇论文充斥学术刊物,创作上也以“解构”经典为时尚。正当此时,学者王文生去美国,发回的文章中说,解构主义在美国(它的发祥地)早已过时了。接踵而至的大浪潮消费主义,即“消费文化”理论,势头更

猛。许多论文都这样开头:“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中”,或者“在消费文化时代”,气势吓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然不应否认消费文化的存在,而且大概也不只当今才有。问题是不能“听风就是雨”,认为今天的文化只能服从和服务于消费,要由消费文化引领潮流。于是,消费生活与欲望就被说成是文艺作品的基本内容;恣意享乐、红灯绿酒,自然就成了“时代精神”的体现了。有教授在大文中论证,“性与金钱”是当今文学的两大主题,两位专事“下半身写作”而遭唾弃的“美女作家”又被抬了出来。教授在这里居然失之不雅,甚至鄙俗,可能也是急于趁时,“走得太快”,“灵魂”跟不上来,失了操守。

在这前后,还有什么“中国艺术进入抽象化时代”“中国进入泛裸体时代”等等的呼喊,这不但“振聋发聩”,而且令人恐惧。试想,而今电视剧和电影是受众最多的艺术形式,如果它们也都抽象化了,那里面既没有具体的人物与故事,甚至连场景也一片混沌,芸芸众生还有什么可看的呢?所谓“泛裸体”,据解释是“突破了艺术的范畴而广泛扩展到日常生活中的裸体行为”。其根据是有餐馆谋划出“女体盛”,街头出现裸奔,画家在人体

上涂绘“作品”等等;还有西方有广场群裸展示而我们一定要去“接轨”。这就更使平常人惴惴不安。试想,如今“胯爷”上街都视为不文明,到那时候若真是满大街赤条条,这社会还有什么文明可言呢?学者们如此抢占风头,争当“先知”,只能是添乱。作为学者,指出并倡导一种社会倾向,第一要看是否符合事实,第二要看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而后者更须重视。例如清末鸦片战争时期,鸦片在中国泛滥是事实,但有识之士指出这个事实,不是要推动它,而是要号召国人起来抵制它。

学者们还是从容一点好;有时候应当站一站,想一想,看一看。如果这样,把消费文化鼓吹得天花乱坠的学者可能会发现,此一理论的创始人法国学者费瑟斯通,对消费文化也并非一味推崇,倒是对这种时代思潮有所批判。例如他的主要著作《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说:“今天没有风格,有的只是时尚。”我们那些脚步匆匆的文人学者们所唯恐追不到手的,正是“时尚”。而关于文化中的“时尚”,王元化先生有深刻的剖析:“一个以时尚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中,是没有真正有深度的精神生活可言的。”

动态

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连晓芳)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民族文学》杂志社协办的“以青春的名义绽放”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会上说,这些年轻作家继承了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呼应着时代的变化,认真研讨他们的创作,对于推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对于认识和拓展中国文学的思想空间具有重要的意义。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分别对照日格图(蒙古族)、苏美嫣

(蒙古族)、鲍尔金娜(蒙古族)、陶丽群(壮族)、马金莲(回族)、麦麦提敏·阿卜力孜(维吾尔族)、艾多斯·阿曼泰(哈萨克族)、陈克海(土家族)、张牧笛(满族)、朱雀(土家族)10位青年作家的作品进行讨论,对他们发自内心的真挚、自觉表现生活的热情和才华给予充分肯定和鼓励,并对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未来发展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据了解,这是今年以来中国作协举办的民族文学创作系列研讨会的第三次会议。

专家学者研讨纪实文学《阿里 阿里》

本报讯 (记者高昌)6月30日,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作家》杂志共同主办的杜文娟长篇纪实文学《阿里 阿里》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何建明出席并作讲话。阿克拜尔·米吉提、梁鸿鹰、彭学明、阎焜明等参加了研讨活动。

《阿里 阿里》为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和创作协重点扶持作品,作者杜文娟先后五次进藏,三次抵达阿里,走访记录了几十位阿里人或援藏干部一辈子的悲欢离合,在作品里展现了高原上的人性真实与纯粹。

与会专家认为,该书让读者更加觉得守边固土的重要和祖国

领土的神圣,让读者了解到阿里的人们是怎样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与外来侵扰抗衡,与心灵的孤独和身体的寂寞斗争,简单而快乐地生活在那里。这是一本启发读者心灵、鼓舞人们用豁达和坚韧对待一切困难的励志之书,需要得到重视和支持。

杜文娟是近年来较为活跃的青年作家。她说,每次去阿里都有新的发现,新的震撼。她想通过自己的作品告诉大家,只有身临其境,将身体和心灵同时融入正午的骄阳、午夜的风光、七月的飞雪、荒漠的辽远、死亡的威胁,才真正理解什么叫生命禁区、什么叫快乐酣畅。

青海将办海子青年诗歌节

本报讯 (记者李珊珊)7月25日、26日,青海省海西州将迎来一场以已故著名诗人海子命名的诗歌盛会——首届海子青年诗歌节。诗歌节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诗歌征集活动,届时将邀请国内知名诗人及诗评家组成专家评审会,进行诗歌评选活动。目前,当地已开工建设海子纪念碑和纪念馆,期望将德令哈打造成“吟游诗人的驿站”。

据海西州常委、宣传部部长牛军介绍,诗人海子曾经写过《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等诗篇,写下“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等深情的诗句。作为海西州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德令哈因而为更多的外界的朋友们所熟知,很多热爱海子的年轻人来德令哈探寻海子的足迹。他表示,希望借举办首届海子青年诗歌节,促进海西州

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海子青年诗歌节今后将每两年举办一次。

位于青藏高原北部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自然和人文资源丰富,是开展汽车、摩托车运动的理想场所。当地另一场文化和旅游相结合的盛事——“激情穿越柴达木——2012中国·青海海西汽车摩托车集结赛”,将于8月6日启程,8月16日结束。

板栗文化研究出新成果

本报讯 日前,由马少春主编的《迁西板栗文化》一书由九州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汇集了板栗文化研究方面的相关成果,尤其是通过对“中国板栗之乡”——河北省迁西县板栗传说、板栗纪事、板栗人物、板栗艺术、板栗美食等方面的深入挖掘和整理,较全面呈现了板栗文化的魅力。据悉,当地的板栗栽培历史已有2000多年。

(王金保)

读《中国文化体制改革30年历史叙事与理论反思》

李珂珂

全面和系统研究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力作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为国家战略目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作为达到文化大发展目标的战略路径,在国家宏观战略体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这就对当前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和更为紧迫的要求。

尽管近20年来,来自公共管理领域、文化产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和文化行业管理一线的管理者从各自不同的视角研究文化体制改革,形成了多种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成果,但却还没有一部专论从历史学的视角系统讨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33年的艰难而壮阔的发展历程。韩永进先生新撰《中国文化体制改革33年历史叙事与理论反思》(以下简称《反思》)一书弥补了这一理论研究上的缺憾。

《反思》是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研究》的成果之一,全书的主旨,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理论作为建设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学的角度探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路径问题。全书分为改革历史、改革内容的描述、启示和理论综述三部分,以“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分期”章开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理论”章结尾,逐步深入,在大量文献研究基础上再度提升,自成一家。在逻辑结构上,全书采取了纵横结合的分析框架,纵向上度在我国文化体制改革33年的历史上依次展开,横向上度则嵌入了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同时将对文化体制改革进程、步骤和特征的分析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中国社会基础结构转型的宏大背景下予以考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理论研究框架。

首先,本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实践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领域内最为引人瞩目的宏大事件即是“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作为一种文化繁荣发展的战略性手段,既是建立与我国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管理体制、文化事业体制和文化产业体制的必由之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测度我国文化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进程的晴雨表。目前,随着我国文化发展与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文化体制改革成为观察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特征的综合性题材。因此,学界对文化体制改革的研究既是一个实践课题,具有行动研究的色彩,但同时又是一个超越文化研究本身的宏观命题。《反思》一书,正是集中体现了身处中国社会转型发展这一伟大时代的学者,力图深入观察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与中国社会发展之间互动关系,实现对33年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历程的理论总结。这一理论研究成果所产生的带动效应,同时也蕴含了文化行业本身理论自觉的意义。

其次是本书具有突出的系统性与创新性。本书充溢着历史的和辩证的思维特色。作者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对过去33年的文化体制改革内容进行了类型化归纳和系统化表达,在系统化的体系中讨论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分期、进展程度、推进策略方面的关键性问题,业已超越了单纯经验描述和经验总结的研究水平,在系统结构中赋予部分以整体性价值。

同时本书注重吸纳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如在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指导基础上,本书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产品三重性的问题,并论述了这三重属性具有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的关系。之前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了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和社会意识形态属性,而作者将其分为政治属性、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是在原有基础上对文化价值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作者在书中明确提出了“四个体系、两个体制、两个格局”的分析框架,总结归纳了近

年来我国在文化建设领域形成的系列新观点,如坚持方向论、公共文化论、文化产业论、文化创新论、对外文化交流论、文化政策法规论、国家文化安全论、提高建设先进文化能力论等。这些新的研究框架和创新性观点,相对于以前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建设研究成果具有体系性的优势;又因为本书是新近撰写,得益于近年来文化体制改革的许多重大突破性进展所提供的经验材料,本书的内容更新,与实践的联系也更为紧密;与实践经验总结性质的文化体制改革案例研究相比,本书又更侧重理论研究。这些都显示了作者对文化体制改革研究课题的宏观把握能力。

《反思》一书的完成,既与作者长期从事文化管理和文化体制改革实际工作的独特经历相关,也与作者在工作实践中勤于思考、不断总结反思的一贯作风相关。近年来,作者先后著有《新的文化发展观》、《新的文化自觉》,主编了《2004—2005中国文化创新年度报告》、《邓小平文艺思想研究论集》,并发表了《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历程与新进展》、《文化产业十年发展之路回眸》、《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十大新论》、《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等文化体制改革方面的论文。正是在这些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成《反思》一书,抛开其学术价值不谈,作者这种积数十年之功对某一重大理论研究课题的坚守,同样值得我们后学晚辈学习借鉴。